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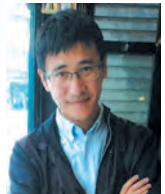
歷史若文學，故事銘記時代。述史或寓言，曾是古老的史詩、小說，連結世界的重要特質。我們通過作家雙眼，思想時間的遠境。本期專輯「台灣年代故事」將邀請您自島嶼關鍵變革的1980年代回想起，一路前赴2040年代。終會發覺，昨日和明日故事，都是當下之事，所有隱喻，都琥珀般折射著此地此時。

本次專題從1980年橫跨至2040年，不免啟人疑竇，起點為何訂在1980年？難道1980年代以前的文學作品不關心年代記憶嗎？之所以如此，這和台灣社會局勢演變有莫大關係。戰後台灣社會遭受高壓戒嚴統治，政治引導文學、管束文學，導致遙想神州的懷鄉文學或一心反攻大陸的反共文學成為官方認可的唯一記憶內涵。儘管196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1970年代鄉土文學各領風騷，但這些文學作品一方面較少涉及在地歷史記憶——現代派作家關注普世議題，

擬造記憶， 擬造新世界

文／詹閱旭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著作《認同與恥辱：華語語系脈絡下的當代台灣文學生產》（2013），譯作《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2015，與施俊州、曾珍珍合譯）。



鄉土派作家側重鄉村的現代化挑戰——另一方面，這些文學流派也並非台灣文壇的官方主導文藝。換言之，1980年代以前的記憶書寫相對較為單一、窄化。

然而，當台灣走過壓抑的社會氛圍，1980年代街頭四處飄蕩各色旗幟、標語、示威遊行山雨欲來。當女性、原住民、勞工、環保團體勇於走上街頭，訴說自己的故事，爭取自身的權益，於是乎，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間接帶動異質觀點的歷史記憶浮出水面。李喬刻劃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時期生活困境的《寒夜三部曲》（1979-1981）、捕捉男同志情慾的白先勇《孽子》（1983）、李昂《殺夫》（1983）大膽以婦人殺夫為切入點，批判傳統父權社會帶給女性的壓迫、陳映真的〈鈴璫花〉（1983）、〈山路〉（1983）、〈趙南棟〉（1987）等系列作描寫1950年代白色恐怖記憶、聶華苓《桑青與桃紅》（1988，台灣版）更是勾勒從中國、台灣到美國的華人女性遷移史。無論是日治、同志、女性、白色恐怖乃至於各種飽受壓抑的邊緣記憶，都試圖在戒嚴社會氛圍下突圍，尋求被看見、被聽見的契機。

歸納以上，台灣記憶書寫的發展與威權體制在1980年代逐漸鬆綁有莫大關係，並且與當時高漲的認同政治熱潮相輔相成，呈顯出錯綜複雜的記憶政治。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的生命